

法蘭西思想文化人書
* BIBLIOTHÈQUE DE FRANCE

LE DÉTOUR ET L'ACCÈS

François Jullien

弗朗索瓦·于连著

迂回与进入

杜小真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BIBLIOTHEQUE DE FRANCE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LE DETOUR ET L'ACCÈS

迂回与进入

[法] 弗朗索瓦·于连著

杜小真译

François Jullien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迂回与进入 / (法) 于连著；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7-108-01120-4

I. 迂… II. ①于… ②杜… III.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334 号

丛书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名 迂回与进入
作者 [法] 弗朗索瓦·于连
译者 杜小真
丛书主编 王东亮 杜小真 罗范 孟华 (按姓氏笔划排序)
责任编辑 倪乐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21.50 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与情感——犹如凭藉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思想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

1152 16

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按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位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藉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前　　言

我们的问题在开始可概括如下：我们认为间接谈论事物有何益处？我们对人与物保持的距离何以能够更容易发现二者——更清楚地说明他们？而因此，这样一种距离又何以成为“有效”的源泉？我们对正面接近世界已习以为常。然而，从迂回的接近中，我们可能获得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迂回何以提供进入？

概括言之，我由之出发的问题是意义的微妙性问题。然而，普通语言在此预感到了某些东西——即使抱有偏见。当我们说：“这是希伯来文”，这只意味着方言制造障碍并使人难以理解其义。但是当我们说：“这是中文”，那就加上了复杂的含意，这种复杂性使得意义变得难以琢磨。按字典的解释，被称作“中国人”者，转义是指“过分追求繁琐的人”。但我们要问：谁掌握着衡量这种过分的尺度呢？因为这仅仅涉及矫饰吗？迂回的精雕细刻难道不是在行使一种权力——由于它的审慎而更具有强权性质——吗？我们这样问远非毫无根据。我希冀探寻意义之微妙会把我们导至何方，它特别擅长使用的方式是什

么,又是什么把它升至为价值水平。在探寻的过程中,我针对中国提出了上面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从古代开始,在中国就有诗歌、史书或先贤言论的文字记载,而话语的“微妙”(微言)是文人所称道的。我并不宣称中国持有“间接”的专权(也不是说在中国人们不能很直接地表达),而是要利用中国对间接表述的明显偏好——这使我们迷惘、着迷——寻问文化的独创性在意义的“创造”中可能到达何方。对于我,这种探寻中不无包含一种挑战:向着一位非汉学家(因为我首先是对他说话),这种挑战成功指出如何向一位既不懂中国语言,也不懂中国情况的人辨解一种话语。因为,如何充当对一种“外来”意义进行阐释的角色呢?

这种探寻的首要意义是它能直接产生效用:即“解读”(décoder)中国。但我们不能把它局限于这种实用的功能之中;另外一种活动会渐进出现。因为间接的迂回会导引我们去探查整个理论背景,去研究意义的谋略问题,就是精神用以依靠那应该重新全面审视的现实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法回避下面这一连串的问题:世界之于我们,是否不再是表象的对象,抑或转义本身不再趋于——在“象征”的范围内——表象?或者,普遍性是否不再是针对思想的东西,而且言语由此不再希求定义(为建立本质的普遍性)而是要转调——为的是与情境相结合?简言之,意识是否不再致力于把现实一分为二以

在超越(存在的或上帝的超越)中奠定现实?那么,为了使世界成为可理解的,我们尽力要谈及的东西就不再是“真理”了吗?一个归纳了上述疑点的问题渐渐提了出来,它成为本书的导线:为什么在中国,这另外的领域——本质的、精神的——没有形成,而在希腊传统中却用之于构筑我们的意义的方向?或如果从反面提问题:制约我们固有的解释模式的理论成见——但总是隐藏着的——是什么?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把这些理论成见视为自明之理,以致于把它们混同于“理性”。

人们对中国感兴趣有许多原因。或由于中国灿烂丰富的文明,或由于看到她在世界上日益显示出来的重要性。而特别促使我学习中文的具有思辨特征的原因是: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表意的而非拼音的);因为中国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时间最长的文明。在我看来,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我并非认为我们在中国之所遇就一定是最相异的,但至少这个地方是他处,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难以与之适应;而由于思想不习惯,很难在其中认识自己。不过,我认为这样一种不适是恰当的,这种特殊的形势是有利的。在我开始学习希腊哲学时,我不无一种奇特的感觉:它于我可能过于熟悉,以致我不能希望

真正认识它(由此能够认同它)。因为它与我们的哲学如此不同,我们与希腊思想暗含着的关联有可能阻碍我们去感知它的生命力——估量它的创造性。必须脱离家族传统,必须切断血统联系,必须保持某种距离。一种理论的距离是合乎希望的——中国恰恰为之提供了便利。

再者,“中国”向我们提供的这别样的观点,并不是事先提出来的,而必须要去建树它。在中国与希腊之间,我试图循序渐进对话语进行的正是这样的观点调整,而不是划出平行线。因为我不认为能够把书页一分为二: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希腊。或毋宁说,我相信声称能一下子解决差异的突出类型只会导致差异的索然无味。因为意义的谋略只有从内部在与个体逻辑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这就产生了反思在此采取的巡回状态。迂回与回归——这项工作是一个过程。但是从一站到另一站,风景在改变,一种全景初步形成。也是因此,我有时会请读者耐心一些,因为对诸多中文著作,只有精读它们的注释,意义的效果才能被概括出来,我也才能了解它们的含意。正面对着中国——间接通过希腊。但是,我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腊。事实上,我们越深入,就越会导致回归。这在遥远国度进行的意义微妙性的旅行促使我们回溯到我们自己的思想。

内容提要

前面,我已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把意义的效果归于预先设定的范畴(通过政治—诗歌—哲学等领域;或通过手段:隐喻、引言、形象等)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别处,我指出,认为在书卷末尾设索引有实用价值的看法只是幻想。但是,既然我选择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事先设定航标我认为是有用的。此外,我们难道不能绘制中国的意义图表(就像17世纪时的那些女才子们笔下常出现的爱情国地图)吗?意义或感情的“微妙性”:二者随后将能够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从这些标界出发旅行。

第二章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中国传统兵书推崇的奇攻与正规战中的方阵进攻是针锋相对的。随后,我又在经典著作中考察这个问题: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委婉的批评,或根据编年史书(《春秋》)所述,在外交场合引言赋诗产生的威力。我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这一章还提供了解读暗示的典例。到了第六章,这些则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

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至少像人们从竞技与政治广场中的希腊式的正面相对出发所感知到的):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由于检查造成的迂回变成为艺术的效果。

第七、八章又谈到了诗文评论,但却把评论引向更理论化的意义:我试图要弄明白为什么与希腊不同,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的对象的世界;而沿顺出这样一种结果,为什么不是从表象性出发(象征性地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寓意化所发现的意义)。从迂回的种种形态出发,我要考虑它使人理解到什么(这两章是本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绞合点)。第七章的开始是一条“隧道”,因为我必须在历史环链中澄清有关诗的间接的种种中国观念。而这在我看来是与希腊的一个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或者说缺少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

从第九章起,我还是考察缺少另一种领域的问题,而这另一领域更准确地被设定为抽象化的和本质的领域。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的是历来被视作精妙之语典范的《论语》。从《论语》出发,就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会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领域的)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因为,通过圣人的言论的多样

变化，我不断地适应了事物的更新；我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常常对之进行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

在读《论语》时，弟子觉悟的间接过程是相应于孔夫子的指示言论的，《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十一章）。《孟子》同样使人了解何为意在传播、而不是说服的言论，或可了解为什么圣人坚持要与哲学讨论保持距离。

第十二章终于展开正面问题的讨论。关于难以形容的东西（绝对与无条件的“一”）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两种解决方法：新道家思想家（注释老子的王弼）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同代人普洛提诺）相联系，中国和希腊互相对话。而我指出在中国由于缺少本体观点，否定的问题是如何被改造的（由此重新对“神秘主义”的普遍性进行质疑）。因为代表“道”的“绝对”特征的“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个体的与具体的实在之外，大象不归结于其他任何实在，但是，它却向我们突出了一个既专一又有限的特征：个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它使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它的任何误解偏见。

另一部古代道家的伟大著作（《庄子》）所达到的语言批评水平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这种要求（第十三章）：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并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我们在此找到了理想的整体

(与部分相对);这也像间接接近的功效——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因为,在适应形势的摇摆中,“波动起伏”的言语从各个角度包围现实,经常贴合诸物的自发运动,并且让我们进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然的“天”之中。

最后两章要指明,一种偏宠文章与其主题之间的“松懈”、“散漫”关系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戏剧(西方室内剧)的例证又一次深化了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分歧,因为,中国评论家(金圣叹)并不对剧本用以表象的方式感兴趣,而是根据迂回而曲折的文人视角去读剧本。我主张用隐喻的距离的观念去确定中文文字的这种理想,并且在最后一章(有关杜甫的部分),为了说明,我举出诗与诗题之间的差距产生的不同效果:由于在二者之中引入了差距,使得诗的蕴意分散难以抓住,诗则变得意味深长。

读者可能在读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然后,特别直接接触过中国哲学的读者将会受益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哲学巡视,而对中国译码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受益于贯穿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最初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

目 录

1	前 言
1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他是中国人”,“这是中文”
24	第二章 正面,侧面
47	第三章 在形象的外衣之下:曲折的批评
69	第四章 中介引语:震撼的力量
88	第五章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如何阅读“字里行间”之意
114	第六章 不可能的分裂(倾斜的意识形态)
140	第七章 情与景之间:世界并不是表象的对象
168	第八章 景之外:转意不是象征
201	第九章 从导师到弟子,言只是指示
231	第十章 不存在本质的领域,或为什么迂回就是进入
257	第十一章 成熟的过程,实现的飞跃

283	第十二章 大象无形或如何指明不可言说之物
315	第十三章 “网”和“鱼”或如何进入自然
345	第十四章 云与月
365	第十五章 隐喻的距离
379	结 论 迂回或剥离为二

第一章 “他是中国人”， “这是中文”

1. 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他的《中国人的特性》¹一书中，曾花费一整章的篇幅评论中国人“迂回表达的能力”。这一章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我们所受的知识教育深感自豪，因为这种教育使我们可以直接深入一个主题直至精髓，当我们触及问题核心时，我们可以完全说出我们想要说的。当然，如若我们考虑到社会压力或外交需要，这种说法应大打折扣。但至少可以说，我们总是靠直线感觉指引行路的，尽管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直线会有明显的改变。然而，对亚裔人，无须认识他们太长时间，我们就能了

* 阿瑟·史密斯(A. H. Smith 1845—1932年)，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在天津、山东传教，1905年辞宣教职，留居通州，致力写作。汉学家。

本书随页注，除标出者外，均为译者注。

解他们的天性与我们的有多么不同；这之间的差别就像地球的两极那样针锋相对。我们无须强调在所有东方语言中那支配至理名言的夸张表达方式，这种夸张有时甚至超乎中文成语的累赘。同样，指出不要用委婉、迂回的说法、不要滥用同义语以表达其实很简单的思想，也是空话，没有人想简单地表达。因此，中国人能够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宣布一个人的死亡，而每一种方式都极优雅地掩饰了事件的残酷。使用迂回说法并不取决于有关人士的社会地位——帝王或苦力——尽管二者所使用的词语可能不同。现在，我们也不想涉及——除非从普泛的观点——语言的真实性问题。当所有人都同意“沿着建设性的方向”使用一些词的时候，每个人都明白旁边的人也同样，只有使用方式在起作用，而不再与真实性有关。

无需深入了解中国人，就可能得出结论说：仅仅听一位天子说话，是不可能明白他要说什么的。某个外国人，中文口语精熟、以至能听懂每个句子、在需要时可用中文写下来，但他却很可能无法准确地表明说话者的思想。显然，这是因为说话者并不想说他真正所想的东西，而只满足于表达某种与他想法类似的东西，为的是让别人以此推断他的思想，或他的部分想法。

为成功地与中国人交往，外国人除了要有较深